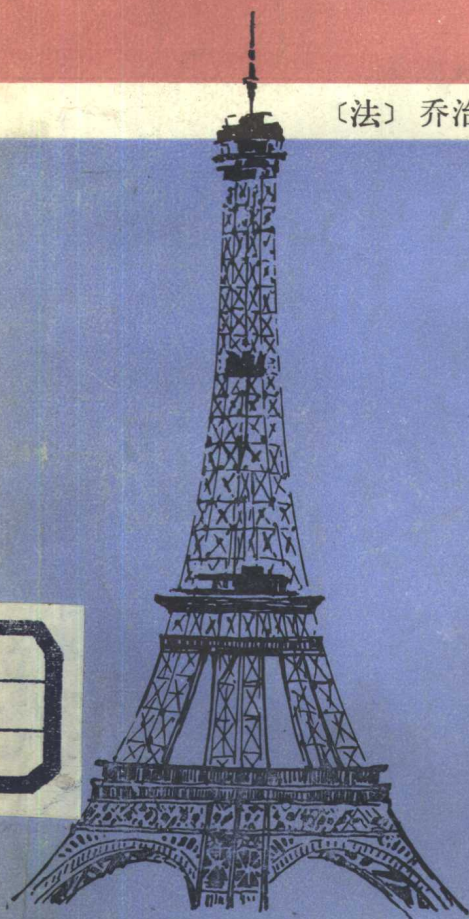


法国社会党及其领导人物

〔法〕 乔治·阿耶歇 马蒂厄·方托尼



新 华 出 版 社

法国社会党及其领导人物

[法] 乔治·阿耶歇 著
马蒂厄·方托尼

沈 炼 周小月 译
孙 谦 校

新 华 出 版 社

Georges Ayache
Mathieu Fantoni
« Les Babrons du ps »

本书根据巴黎法约尔出版社1977年版译出

法国社会党及其领导人物

[法] 乔治·阿耶歇 著
马蒂厄·方托尼

沈 炼 周小月 译
孙 谦 校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75 印张 93,000字

1982年4月第一版 1982年4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3203·017

定价：0.45元

译者的话

本书1977年末在法国出版。两位作者都是年轻人。乔治·阿耶歇(当时27岁)在巴黎政治学院任历史教授,曾著有《法国社会主义发展史》;马蒂厄·方托尼(30岁)是历史讲师,主讲《民主和社会左翼联盟的起源》,同时兼任法国中央通讯社政治记者。

本书扼要介绍了社会党的成长、改组和发展,着重叙述了密特朗的共和制度大会党1971年加入社会党,直到1977年社会党被公认为法国第一大党这段历史。作者还用了相当篇幅介绍了莫鲁瓦(现任法国总理)、德费尔(现任内政与权力下放国务部长)、罗卡尔(计划与领土整治国务部长)、谢韦内芒(科学研究与工艺国务部长)和若斯潘(社会党第一书记)等头面人物的概况和政治主张,并对社会党执政以后可能面临的问题作了展望。作者认为,社会党的宗旨不是成为“一个阶级的党”,已愈来愈失去工人特征,而变为“第三阶级的党”。

本书问世于1978年法国议会选举前夕,作者当时预见到,社会党即使在这次选举中失利,但距离执政的时间为期不远了。事实上,社会党终于在1981年法国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并组成了以社会党为主体的法国现政府。作者在写本书时走访了梅尔马兹、埃斯蒂埃和德洛尔等九位现居

要取的人物，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对我们分析研究社会党的政治主张和法国政局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由于水平有限，译文有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1981年10月

前 言

目前，尽管左翼仍在进行某些论战，但现在的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利于它取得政权。获得1978年“议会选举”的胜利已是伸手可及，而仅仅在三年以前，似乎还属于荒诞学派假设的东西，现在已渐趋成为相当有把握的判断了。民意测验也多次证实了这一点。法国政治阶级的全部行动不可逆转地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所谓左翼者，不言而喻，首先是要有一项新的政治计划，即共同的施政纲领。这同时也是个人事问题，就是说一个主要由新人组成的班底，他们将使新政策具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无论是部长还是国务秘书、顾问还是亲信、无论是担任怎样的官方职务、还是在幕后发挥某种作用的合作者，所有的人都将有权各抒己见。

诚然，在法国的政治习俗中有一种传统，而左翼也远非例外，那就是它倾向于重视思想意识的作用，而低估个人的影响。这可能是一种错误。思想和历史一样从来就是由人创造的。在这方面，马克思1871年在给库格曼一封非常著名的信件中就直言不讳地写道：

“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

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续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①

一项伟大的政策如果没有杰出的人选来付诸实施那是不可设想的。历史上可以说明这个观点的例证如恒河沙数。我们可以想到罗斯福智囊团中那些实施大胆的“新政”的杰出人物，我们还可以想到——距离我们比较近的——1954年以及孟戴斯·弗朗斯的试验，人们对其政策之明智和决策之果断至今还在交口称赞。确实，政治行动越是从实用主义出发，并且摆脱任何理论的束缚，那么实施这种政策的人就越能充分施展他们的才能。

左翼在1978年也不会离开这一规律。而且，鉴于社会党在左翼联盟中不断加强的优势地位，在未来的政府班子中，它的阵容很可能是最为壮观的。

如果执意介绍弗朗索瓦·密特朗——虽然人们对他了解得还很不够，只是表面上了解一些——会使人感到费事的话，那么相反地，了解其周围的、也许明天就在他身边掌握国家大权的那些人物都是很有必要的。

在这些人物中，扬名四海的人寥寥无几。当今，达到《国家选举演出》（再用一下罗歇·热拉尔·施瓦普贝格用过的这个著名标题）中令人陶醉的明星地位的人就更屈指可数了。

● 见马恩全集33卷第210页。本书在引文中删掉了“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续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这句话。
——译注

因此,这些人是谁?什么东西激励着他们?他们的特点是什么?更确切地说,他们的政治背景如何以及他们在党内担任什么职务?他们是搞政治的呢还是搞技术的、是搞党务的呢还是“阁员的人选”?总之,他们与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关系如何呢?

因此,我们打算对社会党的“精华”这个缩影进行一番研究。这个缩影是否反映出象社会党这样一个十分独特的组织的现实呢?另一方面,这也是对未来的一种展望。随着将来的选举结果的成功与否,这些“精华”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是否能找到一个有能力将来接替密特朗的人选呢?

提出这些问题就等于廓清已经成为法国主要政治支柱的社会党的极端复杂性。这也意味着对未来的初步展望,因为,一个领导核心,且不管这个党如何举足轻重,始终是建立在某种力量对比的基础上的,而力量对比本质上又常常是变幻莫测的。

社会党自1971年6月埃皮内“团结代表大会”以来获得了非常迅速的发展。这种发展包括党员的增加和组织的合并。当然这就充实了党,但同时也增加了它内部的复杂性。目前领导班子有时表现出来的复杂状况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队伍继续扩大的事实。因此,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

目 录

前言

I. 谈点历史	1
1. 法国第一大党	11
2. 责任的化身	15
3. 跳板党	22
II. 米歇尔, 加斯东, 皮埃尔和其它人	31
1. 没有争议的领袖	34
2. 亲信集团	42
3. “智囊团”	55
4. “看家”人	75
5. 大区命运	89
6. 第二号人物	99
7. 他们有自己的派别	109
8. 第三号人物	119
9. 一些“我行我素”的人	126
III. 会发生继承之战吗?	139

I. 谈 点 历 史

“我越是思考，我就越发感到历史上是没有什么荒诞可言的。”

弗朗索瓦·密特朗

《稻草与稻谷》

社会党是法国第一大党：这就是解放战争以来出现的重大政治事件。通过1977年3月这次市政选举，这个现实得到了公认，这也是一段时间以来，在人们预料之中的事情。社会党在1971年“市政选举”中只在45个城市中获胜，而这次却在30000居民以上的82个城市中夺魁，现在它几乎代表着30%的选民。

社会党候选人加斯东·德费尔1969年6月在总统选举中只获得5%的选票，和那个晦气的日子相比，现在取得了多么大的进展啊！当时法国的社会主义已下到十八层地狱了。这场灾难远不是一个简单的偶发事件，它是长期衰落所引起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这场灾难始于解放战争的翌日。然而根据莱昂·勃鲁姆的名言，当时拥有316,000多名党员和23%的选民

的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是“时间的主人”。但是冷战以及和右派的一再和解（这种和解往往近乎妥协）很快就使它丧失了法国的优势地位，并导致了一场社会主义的危机。

这场危机的标志就是1958年左翼的分裂，当时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内反对摩勒领导的持不同政见者创建了自主社会党（PSA）（它是未来的统一社会党（PSU）的雏型）。四分五裂之后已成为各种党派、俱乐部、协会和各种派别的这个左翼还有什么希望呢！没有希望了，完全没有希望了。它只是拘泥于自己的过去，恪守它的教条，如果说还有所作为的话——也只是在一定时间内有效，那就是醉心于某些“模式”和哗众取宠的空谈，至于向本国提出具体的和适合国情的解决办法，它是无能为力的。

面对左翼方面可能出现的真空和喜欢挖苦嘲讽的右翼，重新整顿社会党则成为大势所趋。尤其必要的是因为一直存在着一个相当强大的、传统上投左翼票的潜在选民团。因此，社会党人的联盟成为一种存亡攸关的问题了。

在加斯东·德费尔参加总统选举惨败后仅仅几个星期，召开了伊西莱穆利诺代表大会（1969年7月11日—13日）算是完成了第一阶段。在大会倡议人的心目中，这次代表大会应该与1905年的代表大会相媲美，是社会党人的团结大会，1905年的大会实现了让·若雷斯和朱尔·盖德在同一组织中的和解。然而，实际上，这次大会是以半失败告终的。

在伊西创建的组织远没有实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而仅仅实现了部分团结，那就是让·波普朗的社会主义小组

和俱乐部联盟(UGCS)与阿兰·萨瓦里的争取左翼革新俱乐部联盟(UCRG)这两个组织的联合。萨瓦里仅以一票之差击败了皮埃尔·莫鲁瓦而当上了新社会党第一书记。

共和制度大会党(CIR)是一个生气勃勃的主要组织，它聚集了象弗朗索瓦·密特朗、克洛德·埃斯蒂埃或夏尔·埃尔尼这样的人物，公然与“面貌为之一新”的社会党保持距离。这并不是偶然的。实际上，新社会党——某些人最初在新字上加了引号——很大程度上是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和摩勒主义为基础的。它与老党的决裂并非那么斩钉截铁，尤其因为居伊·摩勒还掌握着许多大权，而且社会党内部的力量对比也还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最后，阿兰·萨瓦里的工作显得平庸而没有起色，因为尽管他的廉洁、正直无可厚非，但他既不如摩勒那样善于玩弄权术，又不具备密特朗那样的雄辩才能。

对于新社会党来说，一方面要制定出社会党的行动计划；另一方面，要与共产党恢复“意识形态对话”。然而，这一切都未见多少成效。新领导一开始就采取的那种谨小慎微的作风使左翼根本不可能进行类似1965年左翼联盟那种大刀阔斧的行动。

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对话显得特别摇摆不定和空洞无物。实际上，提出取消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差别作为最终目标的作法难道是严肃的吗？这种旨在消除意识形态的一切障碍以与共产党达成全面协议的对话，实际上是一种不解决问题的最省气力的作法。也许对某些人来说，

这是一种掩饰其不敢承认的反共主义的理想办法。无论如何，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玩艺儿。从1962—1963年的冬天起，特别是从居伊·摩勒某次莫斯科之行以后，他就早已胸有成竹地决定走这条路。自然，直到瓦尔德克·罗歇和共产党人呼吁制订施政纲领的时候，上述对话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结果。

共和制度大会党不遗余力地谴责的正是左翼联盟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空洞辩论和它对提出实际办法方面的一筹莫展。在共和制度大会党党员内部，弗朗索瓦·密特朗早就大声疾呼：“不要只注意已经存在的组织和机构，除了在基层实行和解和团结之外没有别的出路。不要消极等待，团结起来！联合起来！……”

民主和社会左翼联盟的前领导人衷心呼吁“重新统一社会党的大联合”。从这时起，共和制度大会党的许多人认为，左翼的团结与社会党的改革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说，它是与党的建设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不采取与资本主义决裂的战略、不搞左翼联盟，缔造社会党就是不可能的。这是一项决定性的方针，因为它从组织上把一个新党的存在与联盟的战略联系在一起。

这大体上也就是社会党内部有一派——即学习、研究与社会主义教育中心（CERES）——所持的观点，而且支持这种观点的人越来越多，在诸如让-皮埃尔·谢韦内芒、迪迪埃·莫查纳、皮埃尔·吉多尼、乔治·萨尔这些年轻的领导人的鼓动下，学习、研究与社会主义教育中心强烈要求重新建党和采取精诚团结的步骤。1969年，学习、研究与社会主

义教育中心的三名成员用了雅克·芒德兰的假名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还是搞社会平庸》这篇辛辣而出色的抨击文章，它要求党对将近二十五年的错误和失败进行总结。

然而，新社会党走这样的道路条件还不十分成熟。大部分党员希望团结，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只是满足于口头上的冠冕堂皇，而并不要求落实到行动上。更糟的是：1970年10月党的全国委员会在邦迪开会时，重新提出与共产党人结盟以参加1971年的市政选举的主张。

此后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了，新社会党不仅没有变化，而且证明没有能力进行丝毫的变革。密特朗比任何人更清楚，他拒绝继续等待时机，就在同年11月在希农堡发表了一篇著名讲话：

“我们怎样才能达到推翻多数派，从而动员在数量上和从社会学的观点看是多数派的群众呢？我们怎样才能加速提高政治觉悟呢？最后，我们怎样才能向全体法国人提供一个理想的社会前景，从而人们将具有更多的自由，更富于责任感，而且将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呢？”

“要达到这个目的，我认为需要有两个条件：左翼的联合及左翼内部的平衡……”

当时没有任何人，甚至连共产党人也没有注意到他明确提出的左翼内部恢复平衡的思想。往后几年，情况就不一样了。在此以前，希农堡演说的结论是毫不含糊的：

“……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这就迫使我们更好地意识到我们的责任。左翼内部的平衡主要在于社会党人在组织上的

统一。我不是指联合、同盟、联盟、联邦等等，我指的是社会党人的统一。只有组织上的这种统一才能使左翼实现平衡，才能使左翼联盟富有成效，才能使左翼成为多数派。把“左翼联盟”和“社会党人的统一”这两个提法明确地加以区分，“左翼联盟”有明显的政治价值，而并没有组织价值，“社会党人的统一”则意味着社会党人将竭力保持唯一一个政治组织。”

尽管障碍重重，统一的进程还是开始了。不久以后，成立了由尼科尔·凯蒂奥领导的争取社会党人统一的全国代表团，它将筹备6月11日—13日在塞纳河畔埃皮内召开的全国统一代表大会。

如果说伊西莱穆利诺大会是一次未能达到统一的代表大会，那么埃皮内代表大会则进行得十分顺利。然而，愿意重新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力量却象是乌合之众的大杂烩。首先，仅仅新社会党本身就提出了四项不同的动议！

第一个是摩勒-萨瓦里动议，即卸任领导的动议，它要维护现存机构，并重申要对现代派和右派保持警惕。第二个是波普朗动议，它强调与共产党人的附有“意识形态保证”的共同施政纲领，这些保证中仍然提到摩勒派的“先决条件”。第三个动议是由皮埃尔·莫鲁瓦和加斯东·德费尔联合提出的，这就是说由诺尔省和罗纳河口的联盟提出的，它不怎么主张与法共达成协议，而特别强调革新党组织。最后，完全左倾的学习、研究与社会主义教育中心提出所谓“具体的、协调一致的”共同纲领，“在纲领中，应该提出和解决

所有的问题，同时迫使共产党对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和当前的问题给予明确答复。”（乔治·萨尔）

至于共和制度大会党，由密特朗的得力助手路易·梅尔马兹和罗伯特·蓬蒂荣提出的动议，似乎和学习、研究与社会主义教育中心的动议是异曲同工，并宣扬说，与左派联合是组成未来社会党的必要条件。

如果只考虑数量上的众寡或是各组织之间的力量平衡，那么情况就很简单了：共和制度大会党大约有10000名党员，新社会党有70000名。而动议的把戏却使情况复杂化了。因为，很快就表明，任何一个动议都不可能单独获得多数选票。因此，重新组合就势在必行。那么谁和谁联合呢？

首先，按照政治逻辑推理，支持左翼联盟举行代表大会的人应该联合在一起，这就意味着摩勒-萨瓦里、波普朗、密特朗和学习、研究与社会主义教育中心等组织应该重新组合。但事实很快表明，这个办法是行不通的。首先是因为，虽然弗朗索瓦·密特朗和居伊·摩勒同样宣称主张左翼联盟，然而在达到这一目标而采用的方法上他们的意见又大相径庭。摩勒-萨瓦里动议的支持者最多只满足于恢复，甚至加剧与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辩论。弗朗索瓦·密特朗则认为，这种论战现在已不合时宜。工人阶级两个党各自的哲学是如此悬殊，以致要使他们和解，简直是枉费心机。涅夫勒的代表密特朗一再重申必须与共产党具体地谈。这是他的动议的中心思想，动议特别指出：

“与共产党对话不应当从意识形态论战中模棱两可的问

题开始。对话要涉及肩负改造社会使命的政府将会遇到的各种具体问题。谈判这样一项协议是放眼未来，严肃地提出有关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的唯一途径。”

这样，密特朗和共和制度大会党党员比居伊·摩勒的拥护者们谈得具体得多；诚然，后者在谈到“恢复1905年”和“忘却1920年”时振振有词，不过这些话已经不那么完全可信了。

除了方法上的这些分歧之外，还有一个使这两位人物相互对立的深刻纷争。弗朗索瓦·密特朗从来没有真正原谅过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前总书记所搞的阴谋，那就是1968年暗中破坏过左翼联盟，和1969年曾抵制密特朗当共和国总统候选人。而居伊·摩勒只是简单地认为，密特朗不是一个社会党人，“也许是同盟者，但他决不是我们自己人！”●其他一些人象乔治·吉耶则甚至把密特朗说成是一个“政治冒险家”。因此，个人之间的嫌隙是相当严重的。

学习、研究与社会主义教育中心也不愿意和卸任领导联合起来，因为认为他是真正革新党组织的主要阻力。实际上，这样的合并可能就是妥协和蜕化的同义词。只有让·波普朗和社会主义学习、研究和新闻中心（ERIS）坚持认为摩勒-密特朗的联合是可行的。

弗朗索瓦·密特朗最终决定和学习、研究与社会主义教

-
- 居伊·摩勒对本书作者的谈话。（此外，在埃皮内代表大会之后，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前领袖供认：“在工人运动的历史上，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由党外人士担任党组织的领导！”）